

關於近年發現的《元官藏》

李 際寧

近年，隨佛教學術研究的深入，中日佛教學研究者都在致力於佛教文獻的發掘與整理。關於寫本文獻，日本方面調查整理了名古屋七寺的古寫本，正在調查大阪金剛寺的古本經，取得許多重要收穫。刻本方面，系統調查了許多寺院的收藏品，比如奈良西大寺的磧砂藏、金澤文庫的東禪寺本大藏經、快友寺的明版藏經等等，成果顯著。

中國方面，隨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隨文物市場的活躍，不少珍貴文獻文物逐漸出現，以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例，近年以來，收到不少重要佛教文獻資料，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這裡，我將介紹近年新發現的一批《元官藏》，並對這部大藏經及其相關問題作初步研究。

一、《元官藏》的研究史

在大藏經研究史上，《元官藏》是一個版本認定較晚、定名更晚的大藏經新種類，有關這部大藏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研究成果更少。由於該種大藏經僅發現少量零本，缺少完整的框架，故對大藏經的目錄結構、版本系統的研究還處於推測階段。因而，有關這部大藏經的任何研究成果和信息，都值得學術界關注。

有關本藏的研究史，略如下述。

迄今為止，尚未在傳統史料中，發現有關《元官藏》的記錄。

1927 年，小野玄妙在《現代佛教》十一月號（第四十三號）發表了《至元二年刊元版大藏經の跋文に就て》一文，記述其見到的每版四十二行七個半葉版式的佛教大藏經，該藏保留了元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發願文和主持刊藏機構的官員及僧人銜名。小野氏在論文中將至元二年太皇太后發願文和主持刊藏機構的官員及僧人銜名做了錄文，他意識到，這是一部元

代官版大藏經。1929 年小野玄妙再次在日本《佛典研究》第二卷第十三號上刊登論文《元代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大師の刻藏事蹟》，副標題是“大普寧寺本以外の元版藏經特に管主八僧録の刊本文に就いて”，首次刊佈了兩幅《元官藏》的圖版，一幅是順宗太皇太后發願文，一幅是主持大藏經官員和僧人的銜名。小野氏的貢獻如下：(一)、首次披露了該種大藏經；(二)、指出了該種大藏經的官刻性質；(三)、指出該藏是繼《磧砂》、《普寧》兩藏以外發現的又一種元代大藏經。

小野玄妙以後，有關該藏經的研究長期處於停頓。

1984 年，《文物》第十二期刊登了童瑋、方廣錫、金志良撰《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現》，首次認定雲南省圖書館收藏的 32 冊大藏經，與小野氏所述相同，系同一種藏經。三位學者詳細介紹了這 32 冊《元官藏》的狀況，論文附有錄文和照片。三位學者根據該藏經的性質，將之命名為《元官藏》。1986 年，三位學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 3 期上又發表了《元代官刻大藏經考證》，對有關版本問題做了考證研究。方廣錫在《文史》第二十九輯上撰寫了《元史考證兩篇》，對元代官版大藏經的歷史背影等相關問題作了考辨。他們對雲南圖書館收藏品的公佈和研究，至少在下述方面取得了進步：(一)、上述文章從文物實證角度，認定這批雲南收藏品為元代官方刊印的大藏經。(二)、第一次在學術界提出、並將之稱為《元官藏》，填補了大藏經史上的一個空白。(三)、首次確認《元官藏》一版七半葉，半葉六行十七字的版本特徵，確立了《元官藏》的標準版式。(四)、根據太皇太后發願文及刊經銜名、參考歷史文獻，對《元官藏》的刊刻緣起和刊刻時間做了探討，提出其“雕造上限定在文宗天曆三年（1330）”，“雕造下限不會遲至至元五年（1345）年”，可能是“在至元二年（1336）”。(五)、對宋金元各大藏目錄及有關經錄做了比較，對《元官藏》的結構特點做了考察分析。

2003 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其第八章第三節《元官版大藏經》（何梅女士撰寫），在上述資料和研究的基礎上，做了新的探討，作者以《至元錄》、《趙城藏》、《房山石經》、《崇寧藏》與《元官藏》目錄作了比較，認為“《元官藏》是一部據元《至元錄》編目的刻本大藏經。由於《元官藏》的鑄刻，距《至元錄》的編集已相隔四十年，其間又有新譯撰的典籍陸續入藏，以及拾遺編入的典籍，所以

《元官藏》的收經目錄必然會在《至元錄》的基礎上有所改變”。

二、近年新發現的《元官藏》

近幾年來，一批《元官藏》實物陸續出現，筆者因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始終高度關注這批文物的情況。經調查，近年在中國古籍拍賣市場和民間共出現過二十一件（每件一卷）《元官藏》。

（一）、《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二釋初品中四緣義第四十九（一冊）

《大智度論》一百卷，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

1998年，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收到。本件殘缺嚴重，帙號佚失。經折裝，紙張棕褐色，紙質堅韌粗厚，首尾殘，上下邊被裁剪，已看不出原開本狀況，但從版式尚可辨認為《元官藏》。歸屬未詳。

（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六（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唐實叉難陀譯

2003年，私人收藏品，一卷。2006年春季，嘉德拍賣公司上拍。2007年德寶拍賣公司再次上拍。本件原為經折裝，後改裝成卷軸。從卷端所標帙號“體”可以推知，此經為“臣伏戎羌遐邇壹體”八字。卷首配明本扉畫佛說法圖，卷尾有明代補抄。紙色黃褐，紙質薄脆（此外，相同形態的另一卷，由某私人收藏）。

（三）、《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五（一冊）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五卷，唐沙門不空譯。

2005年夏，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收藏到，千字文號“父五”，經折裝，首尾完整，白皮紙，未染潢，紙張厚薄均勻，頗有韌性，書品亦好，每版接紙，首尾加裝橘紅色厚紙封皮。藏書家韋力先生收藏。

（四）、《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四（一冊）

2005年秋，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售出一冊，千字文號“父四”。經折裝，白皮紙，版式特點、紙張風格皆與上述同，書品狀況稍好，當為同一批物。歸屬不詳。

（五）、《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第二（一冊）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二十卷，宋沙門法護等譯。

2006 年秋，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拍賣，一冊，千字文號“聖二”。本冊保存完整，白皮紙印刷，上下裝橘紅色夾板，當為原裝。與上述同批。歸屬不詳。

(六)、《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三（一冊）

2006 年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上拍一冊，千字文號“父三”，版式、紙張、裝潢與上述者全同，當為同一批物。上海龍華古寺收購。

(七)、《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一（一冊）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六卷，宋沙門施護等譯。

2006 年 12 月 4 日，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拍賣一冊，千字文“作肆”。該件紙張、字體、版式風格、裝潢等均同上述五件，上海龍華古寺收購。

(八)、《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上（一冊）

《佛說尊那經》、《佛說佈施經》、《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三經合卷，一冊）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三卷，唐菩提流志譯。

《佛說尊那經》一卷，宋法賢譯。

《佛說佈施經》一卷，宋法賢譯。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宋施護譯。

2007 年 9 月 15 日，北京中安太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上拍。《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上帙號“寶一”，卷首有至元二年太皇太后發願文，卷尾存刊經官員和僧人銜名。本件發願文及銜名，與雲南圖書館藏品、小野玄妙公佈品相同，與國圖稍異。《佛說尊那經》、《佛說佈施經》、《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三經合卷），帙號“念四”。兩冊紙張、版式、裝潢一同上述。

(九)、兩冊三經

另外，某私人收藏兩冊三經。版式、紙張與上述同，為相同處所出。

(十)、九冊

2006 年 3 月，中國國家圖書館從民間收購到九冊：

- | | |
|-----------------|----------|
| 1、念一 《大法鼓經》卷上 |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
| 2、念五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 宋法賢譯 |

- | | | |
|------|----------------------|--------|
| 3、作伍 |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二 | 宋施護等譯 |
| 4、作六 |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三 | 宋施護等譯 |
| 5、作柒 |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四 | 宋施護等譯 |
| 6、作八 |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五 | 宋施護等譯 |
| 7、作玖 |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六 | 宋施護等譯 |
| 8、寶六 | 《一字佛頂輪王經》卷第三 | 唐菩提流志譯 |
| 9、君三 |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 宋天息災奉譯 |

上述十批二十一冊，除 1998 年海王村拍賣公司所出《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二釋初品中四緣義第四十九和私人所屬兩卷《大方廣佛華嚴經》以外，近年陸續面世的其他十八冊《元官藏》，紙張形態一樣，版式風格相同，裝潢一致，我們可以認定，它們的來源相同，應為同一批發現者。

三、新發現本的版本特點

今年出現的這二十一件《元官藏》，筆者幾乎全部有幸經眼，其版式、裝幀、用紙等方面完全相同。以下僅就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品，詳細介紹如下。

(一)、裝幀

該九冊全部為經折裝，每冊裝厚紙封面，顏色橘紅，無經名簽。每冊之外，另包裹書衣，不見繫帶。書衣的紙張較封面略厚，橘紅色。正面粘貼長方條經名簽，下為圓形帙號簽。經名簽與帙號簽均為刻印。

(二)、版式

九冊高寬相同，版式相同，上下雙邊，邊欄外寬內細。板端刊版片號，未見刻工。每版七半葉，總四十二行，半葉六行十七字。《元官藏》這種版式，沿襲了南方系統大藏的裝幀習慣，或許說明它受到該系統的影響。

九冊字體相同，皆略呈豎長形，字體清秀、工整，筆畫勻稱，與《磧砂》、《普寧》兩藏的風格接近。

《元官藏》首尾及版心編號頗有特色，特別是卷尾，板片數均寫為中文大寫數字。以《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三為例：首題下寫為“作六”，版心寫“作陸卷 一”或“佛說頂生王因緣經作陸卷 五”，尾題及音譯後的

冊序號為如“作陸卷五終”，其中“作陸卷”為千字文帙號，“五終”為板片號及本冊的板片數量。

(三)、紙張

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品用皮紙印刷，未染黃，紙張纖維隱約可見，紙質均勻、透薄、堅韌。傳統宋元經折裝本大藏一版只有六半葉，而《元官藏》版式較之略長（七半葉），故紙張有拼接現象。以筆者所見，每版均接紙。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官藏》版式狀況一覽表：

序 號	首 題	帙 號	題 名	行 款	版 心	紙 張	尾 題	音 義	冊 序	書 皮	題 記
1	大法鼓經卷上	念一	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上下雙邊，外寬內細，一版七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念一 念壹	皮紙 接紙	大法鼓經卷上 念一	三行	念壹卷十終	存封底，橘紅色	存發願文 存刊經銜名
2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念五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詔譯	上下雙邊，外寬內細，一版七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念伍 念五	皮紙 接紙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兩字	念五	上下書皮存 橘紅色	無
3	一字佛頂輪王經卷第三	寶六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上下雙邊，外寬內細，一版七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寶六卷 寶六	皮紙 接紙	一字頂輪王經卷第三	十二行	寶陸號卷十四終	上下書皮存 橘紅色	無

關於近年發現的《元官藏》(李)

91

4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二	作伍	奉詔譯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	上下雙邊, 外寬內細, 一版七 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作五卷	皮紙 接紙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二	無	作伍卷伍終	存上書皮 橘紅色	無
5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三	作六	奉詔譯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	上下雙邊, 外寬內細, 一版七 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頂生王因緣經作陸卷 作陸卷	皮紙 接紙	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三	無	作陸卷五終 一行	上下書皮佚	無
6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四	作柒	奉詔譯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	上下雙邊, 外寬內細, 一版七 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作柒卷	皮紙 接紙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四	無	作柒卷肆終	上下書皮存 橘紅色	無
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五	作八	奉詔譯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	上下雙邊, 外寬內細, 一版七 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作捌卷	皮紙 接紙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五	無	作捌卷肆終 一行	上下書皮存 橘紅色	無

8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六	作玖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詔譯	上下雙邊，外寬內細，一版七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作玖卷	皮紙 接紙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六	無	作玖卷伍終	上下書皮佚	存譯場列位
9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君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天息災奉詔譯	上下雙邊，外寬內細，一版七個半葉六行十七字	君三卷	皮紙 接紙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君	三行	君三卷陸終	上下書皮佚	無

(四)、發願文和刊經銜名

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品種，保留了一份太皇太后發願文，位置在《大法鼓經》卷上首端：

贊天開聖仁壽徽懿宣昭貞文慈祐

儲善衍慶福元

太皇太后

竊念荷

祖宗之德

社稷之靈海內乂寧軍國多暇永惟

罔極徒切孝思爰闡

佛乘少酬

景貺於是印施

三乘聖教經律論賢聖集凡三十

藏庶衆善所積百福咸臻伏願



皇帝萬歲

太子千春聖子神孫同膺上壽尚希

餘慶施及遺黎均蒙

覆育之仁共樂無爲之化

至元二年歲次丙子四月吉日誌

《大法鼓經》卷上的書後，保存了組織刊雕大藏經的官員和僧人銜名。這份銜名的順序很奇怪，不論僧名錄、亦或官員名錄，都是由高向低，從左向右依次展開，這與傳統習慣很不同。以下錄文，為照管文字順序，故依據官階從高而低（而非原書從右至左）順序排列：

開府儀同三司秦王荅剌罕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使侍正昭功萬

戶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

大學士領學士院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扈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群牧監廣惠司內火府左都威衛使司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司宮相都□…□禧宗裡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 伯顏

銀青榮祿□…□大御史大夫 撒迪

金紫光祿大夫徽政使宮□都總□府都達魯花赤提調甄用監 伯撒里

金紫光祿大夫趙國公徽政使 常 不蘭奚

榮祿大夫徽政使延慶司使提調掌謁司事 鄭 禿滿達兒

榮祿大夫徽政使同知昭功萬戶都總使府事提調中興武功庫張 住童

榮祿大夫同知徽政院事甄用監卿 朮難

榮祿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仕正 趙世安

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 孛羅

通奉大夫徽政院副使領掌醫監事 荅兒麻室利

徽政院副使 荅兒麻失監

朝散大夫僉徽政院事 高郎

關於近年發現的《元官藏》(李)

95

亞中大夫僉徽政院事	定僧
奉訓大夫同僉徽政院事	察魯
奉訓大夫同僉徽政院事	董阿出
中憲大夫參議徽政院事	不花
朝散大夫參議徽政院事	蔡受益
承務郎徽政院經歷	鎖住
朝散大夫徽政院經歷	趙禮
承德郎徽政院都事	洪文
奉政大夫徽政院都事	程良傑
奉訓大夫徽政院都事	蠻子
奉直大夫徽政院都事	李思齊
正議大夫延慶司使	火爾赤
儒林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員外郎	蠻子海牙
朝列大夫延福提舉	汝奴班
從士郎延福同提舉	荅兒麻新
徽政院掾使	趙國忠
徽政院宣使	張士毅
登侍郎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知事	張庭蘭
承務郎衛侯直都指揮使司知事	楊德實
管領怯憐口諸色民匠都總管府提控案牘	楊遵
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提控案牘	楊珪
奉直大夫內宰司丞	李仲信
承事郎內宰司典簿	王汝弼
收支諸物庫大使	阿都赤
收支諸物庫副使	于允
昭信校尉析成局大使	蘓重兒
通玄妙濟大師大法藏寺住持	用柔
對經講主大法藏寺提點釋	德太
對經講主大法藏寺都寺僧	智妙
對經講主大普慶寺沙門	智通

對經講主晉寧路曲沃縣大悲寺住持	明讚	
對經講主東昌路聊城縣鉄佛堂沙門	余通	
對經講主晉寧路解州安邑縣羅漢院僧	滿閔	
對經西坡居士	涂安国	
銓經講主大普寧寺沙門	惠明	
銓經講主真定路趙州高邑縣慈雲院僧	妙千	
銓經講主	隆吉祥	
銓經講主袁州路報恩寺沙門	繼燈	
銓經講主弘法寺沙門	淨瑜	德彥
銓經講主弘法寺沙門	雲澤	明辯
銓經講主寧夏路大護國仁王寺沙門	智福	
銓經講主	法瓊	興添
銓經講主	德琛	如釋
銓經講主	惠濬	法吉祥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六保留了宋代譯場列位：

講法華經上生經賜紫沙門自初 證義
 講金剛經光因明論百法論賜紫沙門臣德臻 證義
 講金光明經起信論文章賜紫沙門臣行肇 證義
 講圓覺經文章智因大師賜紫沙門臣簡長 證義
 講金光明經觀無量壽經證覺大師賜紫沙門臣首臻 證義
 講法華經南山律三慧大師賜紫沙門臣紹溥 證義
 講法華經圓照大師賜紫沙門臣道一 證義
 右街鑒義講法華經上生經百法論法智大師賜紫沙門臣重珣 證義
 右街講經首座講法華經上生經百法論因明論普智大師賜紫沙門臣脩靜
 證義
 右街鑒義講金剛經因明論百法論明雅大師賜紫沙門臣啓冲 綴文
 梵學慧悟大師賜紫沙門臣文一 筆受
 梵學演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澄珠 筆受
 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奉詔同譯

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西天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奉詔同譯宋代譯場資料較少，而這則譯場列位，反映了《佛說頂生王因緣經》翻譯時的實際情況，異常珍貴。本文不打算就此資料展開討論，故僅介紹資料，其餘問題留待他日研究。

四、《元官藏》雕版與印刷的幾個問題

關於《元官藏》開板和雕畢的時間，就現有資料，尚難斷定。

關於經板使用下限的時間，根據實物證實，當在入明以後。

關於這部《元官藏》的主持者，根據方廣錫先生的研究，是徽政院的一批官員和部分僧人。而徽政院的職能所知，該院主要服務于宮內太皇太后的事物。

上述有關問題，由於資料匱乏，尚難以展開論述。

根據已有資料，本文能夠做的僅僅是就現存幾部《元官藏》的印刷版次和印刷裝潢地點略作探討。

第一、關於印刷版次

據《元官藏》太皇太后發願文稱：“……印施三乘聖教，經、律、論、賢聖集，凡三十藏……”，知這批《元官藏》共印刷了三十部

現存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發願文共有五份四部：即小野氏公佈者、雲南圖書館收藏的兩部（內容相同）、中國國家圖書館一部、北京中安太平拍賣公司拍品（2007年9月15日）一部。

四個版本的印刷順序表列如下

收藏單位	僧名錄		官員名錄	
國家圖書館		“法吉祥”	（孛羅）“知徽政院事”	
小野玄妙本	“能吉祥”		（孛羅）“知徽政院事”	
中安太平	“能吉祥”		（孛羅）“知徽政院事”	
雲南圖書館	“能吉祥”			（孛羅）“中書平章政事”

上述四個收藏單位的藏品，印刷時間有不同，表現為冊后的刊經銜名不同。爲了說明問題，筆者把它拆分為“單元部件”，將可以看清楚它們的組合規律。

刊經銜名可以分爲僧名錄和官員名錄兩部分。就僧名錄而言，小野本、雲南本、中安太平本第一行都作“詮經講主惠濬、能吉祥”，而國圖本作“詮經講主惠濬、法吉祥”（以下簡稱“能吉祥”和“法吉祥”）；官員名錄，雲南本為一類，孛羅的職銜為“光祿大夫徽政使領甄用監中書平章政事虎符提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八赤吉兒千戶所達魯花赤”，而小野本、國圖本、中安太平本都是“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以下簡稱“中書平章政事”和“知徽政院事”）。

上述組合形成三個系統，就有一個先後的問題。判斷先後，有兩條線索，之一是順帝太皇太后不答失里，之二是孛羅的職銜。

關於不答失里，方廣錫先生在其執筆的《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現》、《元代官刻大藏經的考證》及其撰寫的《元史考證兩篇》等論文中，對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施捨發願刊印這部大藏經的背景和元代徽政院的職能作了探討，由此推論《元官藏》的刊雕時間。

不答失里（1306-1340），元文宗圖帖睦爾（1304-1332）妻。《元史·順帝一》卷四十至元元年（1335）八月條，“己卯，議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十二月，“乙丑，奉玉冊、玉寶，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詔曰：欽惟太皇太后，承九廟之托，啟兩朝之業，親以大寶，付之眇躬。尚依擁佑之慈，恪遵仁讓之訓，爰極尊崇之典，以昭報本之忱。庸上徽稱，宣告中外。”至元六年（1340），“詔撤文宗庙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麗”。順帝詔文稱：“不答失里本朕之嬪，乃陽构奸臣，弗体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离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由此推論，上述四部《元官藏》（國圖、小野、雲南、中安）的印刷時間，都在至元六年“削去鴻名”之前。這是大的範圍，至少這四處收藏本，都是在至元六年以前印刷的。

第二個線索，是孛羅職位的遷升。官員的名錄，中國國家圖書館本與小野本同。方廣錫等先生的論文已經指出，雲南本與小野本不同。以孛羅為例，

國圖本、小野本、中安太平本是一個系統，這時孛羅的職銜列在第九位，為“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而到雲南本時代，他的職位則已遷升為第三位“光祿大夫徽政使領甄用監中書平章政事虎符提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八赤吉兒千戶所達魯花赤”。

孛羅任職中書平章政事最早的記錄，筆者甚至認為，從《元史》上下文句考察，應在至元二年七月前後。《元史·順帝》卷三十九：七月“(至元二年)乙丑，中書平章政事孛羅徙宅，賜金二錠、銀十錠。”因為升遷“中書平章政事”，故有“徙宅”、“賜金銀”之幸。如果不差，至少說明在至元二年七月以前，國圖本、小野本、中安太平本應該已經印刷完畢。而雲南本的印刷時間，似乎應在至元二年七月以後。

在國圖、小野、中安太平三本之間，應以國圖本為最早，其僧人銜名的“詮經講主”為法吉祥和惠濬，孛羅是“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以後不知什麼原因，這個名單換了人，改為能吉祥與惠濬，但是孛羅還是“資德大夫同知徽政院事”。雲南本時期，“詮經講主”還是能吉祥與惠濬搭配，而孛羅的職位已經是“光祿大夫徽政使領甄用監中書平章政事虎符提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八赤吉兒千戶所達魯花赤”。

從版本角度考察，以國圖本與中安太平本刊經銜名錄的僧名錄部分看，國圖本字體、版框更緊密、清楚，可能由於“法吉祥”很快被更換，故“法吉祥”版使用的時間較短，就更換為“能吉祥”版，而這副“能吉祥”的版片，使用的更長久，也因此顯得更模糊粗糙一些，這是版片刷印次數過多、時間稍長的緣故。因此，我們可以比較出上述四部版本印刷的先後順序，即國圖本本最早，小野本、中安太平本稍晚，雲南圖書館本最晚。

第二、關於印刷裝潢地點

關於《元官藏》的印刷裝潢地點，還需要探索。判斷大藏經的版本，需要分清楚大藏經的刊雕地點、藏板地點、印刷地點、印刷經坊（或書鋪）幾者的關係。舉例來說，《開寶藏》經板在四川開雕，藏板地點在汴梁太平興國寺印經院（後遷顯聖寺聖壽禪院），開板地點與存板地點不同。《磧砂藏》在蘇州磧砂延聖寺開板，以後經板一直存放在這裡，但是信眾要印刷該藏，就要到杭州，找衆安橋楊家經坊那樣的書鋪印刷裝潢，書鋪根據請印者的要

求，在磧砂延聖寺印刷全部大藏，並將印刷好的經（有可能將每卷經卷成卷筒，以便運輸，類似中國民族圖書館收藏的清龍藏經卷一樣）運到杭州，在杭州加裝卷首扉畫並裝潢成我們今天見到的樣子。這是說，開板地點與經本裝潢不在一地¹。

《元官藏》可能就存在這種複雜的因素。經板在何處開雕、何處存放，目前都沒有資料說明。是誰（經訪或書鋪，或其他印經機構）印刷，印刷地點在何處，筆者也缺乏證據（一般來說，印刷地點與經板存放地點應該是一致的）。就現有資料，筆者僅僅能夠對目前公佈的《元官藏》本的裝潢地點作一點推論。

雲南本 32 冊中，有 7 冊保存有扉畫，據方廣錫先生文章介紹，知有六幅附有刻工題名，即“吉人彭斯立偕弟斯高刊”兩幅，“臨江周仁可刊”兩幅，“古杭于壽刀”一幅，“陳寧刊”一幅。這些刻工都是江南人，特別是刻工“陳寧”，《磧砂藏》的多幅扉畫中，保留有“陳升畫”“陳寧刊”一種，他所雕刻的扉畫，顯然線條更流暢，人物形象更生動。到元末明初杭州衆安橋楊家經坊印裝《磧砂藏》的時候，楊德春坊“陳寧刊”扉畫雕刻的作品，則刀法和雕刻技藝就遜色多了。“陳寧”，黃文弼在其所著《吐魯番考古記》²中，公佈了兩張維吾爾文《八陽神咒經》殘片，其扉畫右下角，就刊雕著陳寧的名字。馮家昇先生認為，《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的雕刻地點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在高昌地區刻的，刻的時候，把《磧砂藏》內《八陽經》的‘如來說教圖’復刻在同鵠文《八陽經》的經頭上；一是在內地刻的，平江（今吳縣）或大都最有可能³。”張新鷹先生在《陳寧其人及同鵠文〈八陽經〉版刻地一讀馮家昇先生一篇舊作贅言》一文中，收集有關陳寧的資料極為豐富，他引用多條材料，論證陳寧在元武宗至大年間已有活動，其活動地點，包括已知屬於他參與雕刻的幾種作品，都在杭州⁴。張新鷹先生的結論，本

¹ 李際寧《佛教大藏經的雕刻、印刷、流通制度》《文津學誌》（第一輯），2003 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²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考古學特刊》第三號（圖版一〇六），1954 年 4 月，中國科學院印行

³ 馮家昇《刻本同鵠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研究》《考古學報》1955 年第 9 期

人深以為是，陳寧是元代杭州刻工，他活動的時間，應該在元代後期，地點在杭州。也就是說，《元官藏》的裝潢地點應該在杭州，就是在裝潢的時候，有關經坊（或書鋪）為雲南本裝上了上述扉畫。

根據歷代大藏經的印刷、裝潢習慣，筆者推測，該部《元官藏》的刊雕地點應該與裝潢地點相距不遠，也許就是杭州地區。

五、《元官藏》目錄結構

《元官藏》的目錄結構是學術界關心的重點，包括近年新發現本，收藏在中國大陸的《元官藏》數量總達五十餘冊，涉及的千字文帙號從“成”字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百六十一到“治”字號《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寺禪院語錄》卷一，考慮到《大慧語錄》總三十卷，千字文帙號已到“治、本、於”三字，故由此推測《元官藏》的總體數量應有六千五百一十卷左右。

近年發現品雖沒有超過雲南圖書館收藏品的字號，但是由於數量大大增加，涉及經典的部類更豐富，對探討《元官藏》的目錄結構，提供了新的資料。筆者選取《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大正新修法寶總目錄本）、《普寧藏》（大正新修法寶總目錄本）、《思溪資福藏》（大正新修法寶總目錄本）、《趙城藏》（蔡念生編《金藏目錄校釋》本）、《房山石經》（遼金刻經）部分與已知《元官藏》帙號比較如下：

元官藏目錄勘對表

序 號	帙號	經名卷次	至元錄	普寧藏	資福藏	趙城藏	房山 遼金刻經
1	成壹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一	～	～	～	～	～
2	成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二	～	～	～		～

⁴ 張新鷹《陳寧其人及回鶻文〈八陽經〉版刻地——讀馮家昇先生一篇舊作贅言》楊曾文、方廣錫主編《佛教與歷史文化》，2001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3	成陸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六	～	～	～	～	～
4	(又一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六	～	～	～	～	～
5	成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七	～	～	～	～	～
6	成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八	～	～	～	～	～
7	成玖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百六十九	～	～	～	～	～
8	巨五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五百五	～	～	～	～	～
9	鱗 69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卷三	鱗 69 7	潛 70 7	潛 70 7	鱗 69 7	羽
10	始 81	大寶積經卷四十一	始 81 53	帝 76 20	鳥 78 23	帝 74 22	官
11	國 92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 佛境界經卷下	國 92 111	裳 88 41	裳 88 46	衣 87 43	推
12	湯 104	佛說大方等大積經 菩薩念佛三昧分卷 第十	殷 103 137	伐 98 65	伐 98 68	民 98 65	伐
13	道 108	佛說無言童子經卷 上	問 107 146	殷 103 74	殷 103 77	發 102 77	—
14	道 108	自在王菩薩經卷上	問 107 147	殷 103 75	殷 103 78	發 102 75	—
15	拱 110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 所問經卷六	垂 109 150	—	—	茂 523 1352(?)	—
16	體 1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第七十六	體 124 154	臣 117 79	臣 117 82	首 116 80	—
17	恭 153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第卷二	常 152 214	木 140 132	木 140 138	草 139 135	—
18	器 189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 第六	覆 188 407	器 189 409	器 189 415	覆 188 403	欲

關於近年發現的《元官藏》(李)

103

19	欲 190	佛說法集經卷四	器 189 409	欲 190 411	欲 190 417	器 189 405	難
20	念 206	大法鼓經卷上	量 192 418	墨 193 420	墨 193 426	量 192 417	悲
21	念 206 三經合卷	佛說尊那經	賢 204 517	輦 508 1253	輦 508 1253	冠 506 1249	傾
		佛說布施經	516	千 503 1193	千 503 1193	戶 497 1177	孰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 經善巧方便品	512	宅 537 1406	宅 537 1412	阜 540 1419	—
22	念 206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賢 204 519	輦 508 1254	輦 508 1254	冠 506 1239	傾
23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第卷一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4	作 207 (又一部)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一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5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二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6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三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7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四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8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五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29	作 207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 卷第六	念 206 523	—	—	說 557 1467	—
30	聖 208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 問經卷第二	作 207 525	磻 528 1329	磻 528 1333	武 559 1474	—
31	堂 222	不空羼索陀羅尼自 在王咒經卷下	禍 225 540	—	—	潔 164 290	—
32	寶 256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 密陀羅尼經卷上	寸 237 618	絲 195 429	絲 195 435	悲 194 426	染

33	寶 256	一字佛頂輪王經卷第三	寸 237 619	絲 195 430	絲 195 436	悲 194 426	染
34	父 242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三	事 243 659	佐 533 1351	佐 533 1356	車 517 1303	相
35	父 242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四	事 243 659	佐 533 1351	佐 533 1356	車 517 1303	相
36	父 242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五	事 243 659	佐 533 1351	佐 533 1356	車 517 1303	相
37	事 243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	君 244 664	阿 535 1365	阿 535 1365	肥 519 1312(?)	夾
38	事 243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	君 244 674	伊 531 1337	伊 531 1338	侈 515 1291	羅
39	事 243 兩經合卷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 不空羼索毗盧遮那大灌頂光真言一卷	君 244 676 675	—	—	碑 526 1373 勒 525 1366	—
40	君 244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嚴 246 682	戶 496 1147	戶 496 1146	府 488 1139	阿
41	川 246	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花部念誦法門	澂 277 849	—	—	銘 528 1388	八
42	友 362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二十四	仁 369 1213	和 330 909	和 330 908	尊 327 897	—
43	切 365	四分律藏卷二十一	惻 372 1214	夫 333 910	夫 333 909	陸 332 898	—
44	仁 369	五分比丘戒本	離 376 1221	外 337 917	外 337 914	隨 336 903	—
45	虧 38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六	神 391 1261	—	—	—	—
46	帙號不詳	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二	—	—	—	—	—

關於近年發現的《元官藏》(李)

105

47	物 397	十地經論卷七	爵 444 1277	谷 217 561	谷 217 567	空 217 551	傳
48	啓 444	釋摩訶衍論卷四	陞 457 1392	—	—	—	寧
49	啓 444	釋摩訶衍論卷五	陞 457 1392	—	—	—	寧
50	密 563	衆經目錄卷二	密 563 1533	筵 450 1068	筵 450 1066	肆 449 1056	—
51	密 563	衆經目錄卷五	密 563 1533	筵 450 1068	筵 450 1066	肆 449 1056	—
52	雞 629	續高僧傳卷八	土 582 1553	內 468 1088	—	左 469 1076	—
53	治 649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 山能仁寺禪院語錄 卷一	—	—	—	—	—

列表說明：

第 1 欄，序號，表示目前大陸已發現的《元官藏》之序號。第 2 欄，帙號及各帙序號（千字文序號）。第 3 欄，經名卷次。第 4-8 欄，上排為各藏目錄帙號及序號，下排為本經在目錄中的序號。

第 1-8 號，般若部。

《大般若經》，由於建首之經典的位置相同，沒有比較的可能，故列以存目。

第 9 號，般若部。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三，“鱗三”，第 69 字，與《至元錄》、《趙城藏》帙序號相同。

第 10-11 號，“寶積部”屬經典。

《大寶積經》卷四十一，“始一”。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卷下。

上兩經分別排在第 81 字和第 92 字，與《至元錄》帙序號相同，而與其

它各藏皆異。《至元錄》標明本錄的編撰體例，即開元錄所紀經律論、貞元錄所紀經論、祥符錄所紀經律論、景祐錄所紀經律論、弘法入藏錄及拾遺編入經律論。比如，在般若部內，依次收入開元錄所紀般若部、貞元錄所紀般若部、祥符錄所紀般若部、景祐錄所紀般若部。《至元錄》打破了傳統大藏經的編目體例，將宋代後續譯經依類排入各部，故有本經編為第 81 字“始一”的結果。從這一點看，《元官藏》的確受到《至元錄》的影響。上述觀點，何梅女士已有論述。

第 12-15 號，“大集經”部屬。

《佛說大方等大積經菩薩念佛三昧分》卷第十，《元官藏》為“湯”，《至元錄》為“殷”。

《佛說無言童子經》卷上，《元官藏》為“道”，《至元錄》為“問”。

《自在王菩薩經》卷上，《元官藏》為“道”，《至元錄》為“問”。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卷六，《元官藏》為“拱”，《至元錄》為“垂”。

《元官藏》帙號與《至元錄》比較，皆後退一字。關於“大集部”收經範圍，《至元錄》說明：“總諸錄中大集部類並編于此”，這包括“開元錄二十四部，貞元錄二部，祥符錄一部”，其體例仍屬《至元錄》，而經典順序的次序上，已經開始突破《至元錄》。而《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卷六在《普寧》、《資福》未見，《趙城藏》“茂”帙第 1352 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應即是此經。

第 16 號，“華嚴部”經典。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六。本經僅有帙字，沒有序號。從現有資料看，與《至元錄》同。

第 17-20，“五大部外重譯單譯”部，開元錄、貞元錄所紀大乘經典。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第二，“恭”字，千字文第 153 號，《至元錄》編為“常”，千字文第 152 號，第 214 號經，《元官藏》推後一字。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六，“器”字，千字文第 189 號，《至元錄》為“覆”字，千字文第 188 號，《元官藏》推後一字，其他諸藏目的帙號大體也在前後一、二字之差。

《佛說法集經》卷四，“欲”字，千字文第 190 號，各藏或為“器”字或

為“欲”，房山石經為“難”字，《元官藏》、《趙城藏》推後一字，《普寧》、《資福》同。

《大法鼓經》卷上，“念”字，千字文第 206 號，《至元錄》、《趙城藏》同為“量”字千字文在第 192 號；《普寧》、《資福》相同，為“墨”字，千字文在第“193”號。

上述諸經同屬於開元錄、貞元錄所紀大乘經典，千字文帙號差距已經不大。

第 21-30 號，“五大部外重譯單譯”部，祥符錄、景祐錄所紀大乘經及拾遺。

《佛說尊那經》、《佛說佈施經》、《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元官藏》為三經同卷，編為“念四”帙，千字文在第 206 號。《至元錄》三經共在“賢”字，千字文在第 204 號，但是沒有三經合冊，而是分別放在了第 517 號、516 號和 512 號。其他諸藏三經分別編在各處，位置差距甚大。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念五”，千字文在第 206 號，《至元錄》在“賢”字，千字文在第 204 號，《元官藏》推後一字。《普寧》、《資福》、《趙城》在“輦”（第 508 字）、“冠”（506）字，差距不大，《房山石經》載“傾”，位在第 552 字。

《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一至卷第六，“作”字，千字文在第 206 號，《至元錄》在“念”字，千字文在第 206 號，《元官藏》推後一字。該經《普寧》、《資福》未見，《趙城》在“說”（第 557 字），位在第 1239 號。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第二，“聖”字，千字文在第 208 號，《至元錄》在“作”字，千字文在第 525 號，《元官藏》推後一字。其他諸藏位置差距甚大。

《至元錄》以外諸藏目錄，結構與《至元錄》相異，宋代新譯經典往往編在宋元入藏經論或宋元續入藏經論，故有上述《普寧》、《資福》、《趙城》諸藏前後差距極大的原因。由此看來，《元官藏》結構受《至元錄》的影響。但是，也並非《元官藏》照搬《至元錄》，諸經之間，頗有調整，儘管原因還不清楚，但是趨勢是明顯的。

第 31-41，“五大部外重譯單譯”部大乘秘密陀羅尼儀軌等。

《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卷下，“堂”字，《至元錄》在“禍”字，

《元官藏》又提前四字。該經《普寧》、《資福》不見，《趙城》在“潔”字。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上，“寶”字，《至元錄》在“寸”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一字佛頂輪王經》卷第三，“寶”字，《至元錄》在“寸”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第三至卷第五，“父”字，《至元錄》在“事”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事”字，《至元錄》在“君”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三世最勝心明王經》一卷，“事”，《至元錄》在“君”字，《元官藏》提前二字。

《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不空罽索毗盧遮那大灌頂光真言》一卷（二經合卷），“事”字，《至元錄》在“君”字，《元官藏》提前二字。《普寧》、《資福》不見。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君”字，《至元錄》在“嚴”字，《元官藏》提前三字。

《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花部念誦法門》，“川”字，《至元錄》在“激”字，《元官藏》提前六字。《普寧》、《資福》不見。

上九經的位置，屬於“五大部外重譯單譯”部大乘秘密陀羅尼儀軌部分，依《至元錄》的結構，跨度極大，到《元官藏》中，卻多有調整，形成幾個特點：

(1)、前次各經的順序位置，《元官藏》較《至元錄》退後，相差大致一、二字。到這裡，《元官藏》的位置卻提到《至元錄》之前，甚至提前多達五字。看來，雖然兩經在大結構方面相同，但是在具體部類內部調整較大，這大概說明《元官藏》收錄的宋元譯經較多，而對傳統經典有所調整。

(2)、其中《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與《不空罽索毗盧遮那大灌頂光真言》在《元官藏》中為二經合卷，而到《至元錄》中，順序發生了前後顛倒。這說明《元官藏》在捨取排列經典方面做了重新調整，反映出《元官藏》的特色。

(3)、由於這批“大乘秘密陀羅尼儀軌”經典不少來源於不空等翻譯經

典，往往傳統南方系統大藏失收，而為《趙城》所有，本來這是《趙城藏》的特點，現在《元官藏》中發現，說明這批經典很有可能來源於《金藏》，或許將來在材料更豐富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元官藏》在哪些方面繼承了《金藏》的特點。

第 42-45，大小乘調伏藏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四，“友”字，《至元錄》在“仁”字，《元官藏》提前七字。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一，“切”字，《至元錄》在“惻”字，《元官藏》提前八字。

《五分比丘戒本》，“仁”字，《至元錄》在“離”字，《元官藏》提前八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十六，“虧”字，《至元錄》在“神”字，《元官藏》提前八字。

四部經典的前三部，諸藏所收，惟《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六》諸藏皆無，《至元錄》注為“唐天后代三藏義淨譯，新編入藏”。又注云：“上一律二十卷二帙，蕃本同。‘動’、‘神’二號”。

第 46-49 號，大乘釋經論

《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二，因原本殘甚，千字文帙號不詳，故不作比較。

《十地經論》卷第七，“物”，《至元錄》在“爵”字，《元官藏》提前九字。

《釋摩訶衍論》卷第四至卷第五，“啓”字，《至元錄》在“陞”字，《元官藏》提前十四字。

《釋摩訶衍論》十卷，龍樹菩薩造，後秦天竺三藏筏提摩多譯。此論諸藏未見，唯房山石經中遼金刻經有之。《至元錄》注曰：“新編入藏”。又云：“此論蕃云有本，未至於此。”也就是說，此論有蕃本，但是沒有傳到中原，整理《至元錄》的諸大德，沒有見過此蕃本。此論《趙城藏》中未見，不能說《趙城藏》中就沒有，但是即然在房山遼刻經中收藏，說明此論或有其他翻譯來源。這條信息使筆者強烈地意識到，不能忽視遼金時期入藏經典對《元官藏》的影響，甚至部分在北方地區流傳較廣而南方少傳的經典，也可能是《元官藏》的來源。《釋摩訶衍論》的來源可能就是遼代譯經。

第 50-51 號，東土聖賢集撰

《衆經目錄》卷第二和第五，“密”字，《至元錄》同。

《衆經目錄》有“法經錄”與“仁壽錄”之別，筆者承方廣錫先生慷慨提供當年調查雲南圖書館《元官藏》的筆記和三篇論文手稿，證實雲南圖書館藏本為“法經錄”。“法經錄”七卷，《至元錄》的千字文帙號，為“密”字。故兩藏相同。

第 52-53 號，

《續高僧傳》卷第八，“雞”字，《至元錄》在“土”字，《元官藏》推后六十六字。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寺禪院語錄》卷一，“治”字。

從這裡更清楚地看到，各部調整相當大。各藏的特色，往往在最後部分得以體現，《元官藏》越到後邊，各經典位置的調整越大，說明它的目錄框架確是以《至元錄》為本，但是在經典的選擇上，來源可能更廣泛，這是它不斷調整目錄次序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述，《元官藏》的目錄結構有如下特点：

- 1、受到《至元錄》框架的深刻影響。
- 2、在各部經典的具體組織上，《元官藏》並非嚴格按照《至元錄》次序組織入藏目錄，而是有調整，甚至在部分類目有重大調整。
- 3、《元官藏》的經典來源，除傳統大藏經收錄者以外，也受到《至元錄》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宋元以後新譯經典，《元官藏》給予了高度重視。
- 4、《元官藏》也受到《金藏》的影響，不少經典，可能甚至直接來源於《金藏》。
- 5、《元官藏》可能吸收了部分遼代譯經和北方地區流傳的經典。

The Official Buddhist Canon of the Yuan Dynasty (元官藏 *Yuan guan zang*) (Li) 111

Summary

The Official Buddhist Canon of the Yuan Dynasty (元官藏 *Yuan guan zang*): Recent Findings

LI Jining

The present article describes and examines the recent findings from *The Official Buddhist Canon of the Yuan Dynasty* (元官藏 *Yuan guan zang*). It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five sections:

(1)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search on the *Yuan guan za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Yuan guan zang* was a relatively late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studies on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大藏經. The exact determination of its title actually occurred at an even later date. Actually,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ncerning this Canon are extremely scanty, and the research on it is even scarcer. Among the latter, the following studies can be mentioned.

Any survey of this field must start with the essential contribution brought by the Japanese scholar Ono Gemmyō 小野玄妙. Actually, it was Ono who first pointed out the existence of this Canon and determined that it was an officially-sponsored edition. He also showed that the *Yuan guan zang* represents an edition different from the *Qisha* 磧砂 and *Puning* 普寧 Canons printed during the same Yuan 元 Dynasty.

More recent studies undertaken by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Dong Wei 童璋, Fang Guangchang 方廣鋁, and Jin Zhiliang 金志良 have shed ligh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an guan za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traditional woodblock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sponsor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ts printing, on the probable date of its beginnings, and on the structure of its catalogue. Regarding the latter, we must also mention here He Mei's 何梅 contribution which collates the catalogue of the *Yuan guan zang* with the

112 *The Official Buddhist Canon of the Yuan Dynasty* (元官藏 *Yuan guan zang*) (Li) *Catalogue of the Zhiyuan Era* (至元錄 *Zhiyuan lu*). He Mei argues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former is based on the latter.

(2) In this section, I focus up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ragments from the *Yuan guan zang* which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recent years.

(3) I discuss the format, number of columns and characters per folio, paper type and quality, and the dedications 願文 as well as the lists of officials 銜名 recorded in the extant fragments of the *Yuan guan zang*.

(4) This section deals with the chronology and place of the carving and printing of the woodblocks of the *Yuan guan zang*.

The lists of officials 銜名 actually contain names of monks and lay bureaucrats who supervised and/or participated to the printing of the Canon. This allows us to make some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printing of the extant fragments. This appears to be as follows. The fragments acquir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國家圖書館 seem to be the earliest. They are followed by the fragments in Ono Genmyō's Collection and the fragments in the Zhong'an 中安 Collection. The fragments in the Yunnan 雲南 Collection appear to be the most recent.

Judging from the technical peculiarities of the fragments in the Yunnan Collection,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printing and binding of the Canon took place in Hangzhou 杭州. There is no direct evidence regarding the site where the woodblocks were carved. We know, however,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printing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China that usually the woodblocks were not carved far from the site where the editions were printed and bound. It is, therefore, quite probable that the woodblocks of the *Yuan guan zang* were also carved in the Hangzhou region.

(5) In this section, I exam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catalogue of the *Yuan guan zang*. This is a section which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and which, I hope, will cast new light on the this subject. I compare the structure of all the fragments of the *Yuan guan zang* currently found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at of the *Zhiyuan lu*

The Official Buddhist Canon of the Yuan Dynasty (元官藏 *Yuan guan zang*) (Li) 113
 至元錄, the *Zhaocheng Canon* 趙城藏, the *Zifu Canon* 資福藏, the *Puning Canon*
 普寧藏, the *Fangshan Stone-Carved Canon* 房山石經 (scriptures carved during
 the Liao 遼 and Jin 金 Dynasties), etc. Here are my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origins and peculiarities of the catalogue of the *Yuan guan zang* :

1.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atalogue of the *Yuan guan zang*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Zhiyuan lu*.

2. However, as far as the concrete structure of each section of
 scriptures is concerned, the *Yuan guan zang* is not organised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of the *Zhiyuan lu*. One can actually find even
 sections which were considerably re-arranged by the editors of the *Yuan guan*
zang.

3. Roughly speaking, the scriptures included in each particular vers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can be divided into (1) the well-established
 corpus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as part of any *Tripitaka* and (2) those texts
 which could be added or de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dactional policy and
 judgement of each separate edition. The *Yuan guan zang* shows the same
 pattern : it consists of (1) the standard corpus, and (2) newly added texts. As
 far as the latter are regarded, the *Yuan guan zang* shows considerable
 influence from the *Zhiyuan lu*, especially for the new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from the Song 宋 Dynasty on.

4. The *Yuan guan zang*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Jin Canon* 金藏.
 Actually, quite a few of its texts may have originated directly from the latter.

5. The *Yuan guan zang* may have also incorporated some translations
 made under the Liao 遼 Dynasty as well as some texts which circulated in
 North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Florin Deleanu)

Research Librarian,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114 *The Official Buddhist Canon of the Yuan Dynasty* (元官藏 *Yuan guan zang*) (Li)

*and Special Collectio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Research Fell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